

战争与动员：晋绥根据地民众动员的历史考察

张慧如

（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晋中，030600；zhr18234774287@163.com）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绥革命根据地所开展的民众动员，是激发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最终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方式，其主要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四个维度。通过村选运动、勤政廉政及群团组织强化政治动员；实施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及促进商业贸易以推动经济动员；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新闻出版及文学艺术事业深化文化动员；开展四大动员、精兵简政及双拥运动加强军事动员。这些综合措施有效提升了民众参与度，巩固了根据地，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保障，积累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抗战；中共；晋绥；民众动员

引言

晋绥革命根据地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抗日根据地之一，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途径开展群众动员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民众动员经验。这不仅能在抗日战争期间动员广大群众，增强抗战力量；而且也能对于今后中国共产党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新时代要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晋绥革命根据地群众动员的丰富经验中汲取助力新时代发展的强大力量，从而团结带领、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共同奋斗。

1. 政治引领：以民主建设凝聚民心

政治动员主要是通过政治活动提高农民、基层干部和群众组织的政治觉悟和参战意识。毛泽东曾指出：“要想取得伟大民族战争的胜利，必须要进行普遍的、深入的政治动员。”为了争取抗战胜利，中共在晋绥革命根据地广泛开展以村选运动、实施勤政廉政、成立群团组织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动员，使中国共产党及其广大民众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1.1. 村选运动

抗战时期，无论是抗战动员，还是根据地建设，以及抗日部队的兵员补充，军需物资的供应，都离不开革命根据地所在区域农村的支持。农村革命政权的领导权是掌握在哪些人手中，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生死存亡。只有强有力的领导才能确保革命斗争的胜利和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从而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权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也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根本原则。

1940年9月，晋西北行署第二次行政会议通过并颁布了《晋西北村选暂行条例》和《晋西北村政权组织暂行条例》，确定农村政权是民意机关（公民大会或代表会）与执行机关（村公所）的统一体，村主席和代表（村长与会长）都要经过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决定。废除封建的闾邻制，实行代表制。

随后，在1941年3月，新政权自上而下逐级召开了选举准备会议，不仅成立了村选指导委员会，各村还都普遍建立了村选委员会。同时，还确定了22个行政村为试选单位进行实验，这次会议为村选运动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村选运动大体经过宣传教育、选民发动、调查户口、登记公民、划分公民小组、实行民主选举等程序，最后选出村长，建立村民委员会。选举完全是平等自由的。经过实践，根据兴县35个行政村的统计，“自然村公民选举村代表参选者占应参选者的87.36%，村国民大会参选者占应参选者的80.51%”；据晋西北14个县44个行政村的统计，有“80%以上的男女公民参加了选举”[1]。这些数字，充分表明了晋绥革命根

根据地村选运动的普遍性、深入性和它的伟大成功。村选运动在根据地真正实现了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经过选举产生的村政权由此真正发挥了抗日民主政权的作用，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根据地的发展中来。

1.2. 勤政廉政的实施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强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2]从晋绥革命根据地创建时起，各级组织在八路军帮助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还通过实施勤政廉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据地的干部为实施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建立和巩固抗日政权，大力进行发动民众和组织民众的工作，激发农民的政治热情和抗日积极性。

新政权建立之初，即宣布实施勤政廉政，表现在组织领导、机构设置、制度健全和工作作风等各个方面。各级干部不仅深入研究政策法令，更在执行过程中严遵程序、步骤与方法，确保每一项决策都能精准落地。在机构设置层面，各级政府构建了政务会议制度，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得以有效贯彻。群众的声音被充分倾听，他们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参与决策过程。制度方面，分工明确、检查严格、报告总结及时，这些制度为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在工作作风上，干部们更是身体力行，密切联系群众，无论身处何地、从事何种工作，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群众同甘共苦。农忙时节，他们与群众并肩作战，抢收抢种，这种亲民的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和支持。据统计，“每个干部都毫无例外地完成1石3斗小米的生产任务，即要生产个人7个月的粮食。续范亭、牛荫冠等带头发起生产节约运动，决定每人每日节约米面2两，由一斤半减至1斤6两（1旧秤16两为1斤），与全体军民共渡难关”[3]48。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干部们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忠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以身作则，通过勤政廉政的实际行动和“平民化”的作风，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官民关系。人民群众在这种关系中找到了归属感，对干部们产生了深深的认同感，有效地动员了人民群众。正如邓小平所言：“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度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4]217

1.3. 群团组织的成立

抗战时期，一系列的群团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民众动员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毛泽东非常注重群众运动，他一直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中国共产党提出：“只有把广大人民群众有效地组织起来，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力量，否则就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6]抗战爆发后，在中共发动组织下，晋绥抗日根据地出现了农救会、工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群团组织，这些组织独立于政府之外，但又与政府存在着紧密联系，其发起的群众工作与政府工作相互配合，承担着战时动员和维持秩序的任务。

根据地的农救会是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愿结合起来的群众组织，主要开展保护农民切身利益的工作，即借粮、借种子和减息。在这些实际工作中，中国共产党注意发现积极分子，争取觉悟高、敢斗争、愿为群众谋利益的先进分子入团入党，培养任用干部，并以他们为中坚，发展抗日自卫队，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以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农救会还协助政府对原有的旧区、乡长加以任用，改造下层行政机构。为了使农救会具有更加正规的意义，农救会成立后进行悬榜通知，在村镇张贴农救会成员名字，明确其权利与义务。

正如毛泽东所说：“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7]青救会是群团组织中最活跃的一个组织，他们积极组织青年学生参加抗战，发动农村青年参军，团结动员了广大青年。同样，工救会积极动员组织成员做了各种的救亡工作，为抗战胜利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妇救会在动员和组织妇女走出家门参军抗战，组织妇女加入缝纫队、洗衣队、军鞋制作队，特别是在解决妇女的特殊利益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毛泽东指出，群团组织（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及抗日团体）是“民主的人民政权之最重要的支持与依靠”，是党“与工人群众及一切劳苦大众的联络桥梁，是党的政治影响的传达者，是人民政权的轮带”[8]。这些群团组织协助党真正地了解民情、民声、民意，增强了党的影响力、号召力和凝聚力。群团组织的实践活动，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粮食、弹药等各种军需物资和人力支持，壮大了抗战队伍，支援了抗日前线，体现了群团组织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凝聚了强大力量。

2. 经济激励：以民生建设赢得群众

马克思曾说：“把人和人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革命战争要想拥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参与，那就要满足并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动员广大群众，晋绥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以减租

减息、大生产运动、发展商业贸易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动员，这些举措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信心，切实满足了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和自身利益，这为推动抗战动员和促进当地新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1. 减租减息

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基本生活保障是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军参战的首要条件。抗战初期，晋绥边区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广大农民因缺地少地而陷入重重高利盘剥之下。为了解决这种困境，根据中共中央1937年《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的减租减息政策，在晋西北的兴县、岢岚、保德、河曲等县开展了一定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运动，不单纯是经济斗争，而且是树立基本群众优势、巩固基层抗日民主政权、巩固农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运动开始时，干部积极向宣传党的减租减息政策、租佃的阶级关系、雇主与雇工的阶级关系以及开展运动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步骤。通过宣传讲解，提高农民觉悟，使农民初步懂得了自己受苦受穷的根源，懂得了自己要解放自己。于是减租减息运动很快在各地开展起来。与此同时，抗日政府对地主上层人士，也进行了必要的教育工作，以减少阻力。

“当农民努力地投身于抗战和生产建设时，并且成为‘基本力量’时，减轻农民负担就成为一件最必要的工作，不然他们就不可能持续积极地投身于这种事业之中”[9]。1944年8月28日，中共晋绥分局发出《关于今年普及减租运动、深入群众工作的指示》。经过实践，“到1944年底，晋西北各县的减租大约完成了75%，兴县完成了90%”[10]。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扎扎实实，既极大地削弱了封建势力，提高了农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又鼓舞了农民生产和抗日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保障了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

2.2. 大生产运动

正如马克·赛尔登说：“生产运动旨在通过动员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来增强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干群之间的团结。”[11]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是中共在抗战时期领导根据地军民，通过军民兼顾，组织劳动互助，动员群众广泛参与的自上而下的根据地生产建设运动，这不仅仅是晋绥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运动，更是为了能够动员根据地广大军民奋力抗战的一项动员策略。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为开展大生产运动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和有力的支持，推动了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提升。1940年12月，中共晋西区党委召开了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会议特别决定把发展生产、加强经济建设作为1941年根据地的中心任务之一。1941年3月，晋西北行署又召开财政经济会议，明确提出以农业为主发展生产的方针。之后，全边区生产建设工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进步。在各级政权的组织实施下，晋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迅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广大人民群众与机关部队全体同志一齐动手，建立革命家务，组织劳动互助，展开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仅1944年1至6月，“群众、部队、机关即开荒77万多亩，机关部队还种棉5,632亩”；仅二分区各县共“兴修水地5,615.9亩，计河曲2,367亩，保德1,788.9亩，岢岚1,020亩，偏关440亩，可增产粮食1,103石（公粮斗）”；仅河曲、岢岚、偏关等3县“半年内即增加猪、羊38,254头（只）”；1944年上半年，仅“纺纱妇女就达53,527人，比1943年增加将近1倍”[3]68。

大生产运动的健康发展，克服了根据地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军民生活，基本上达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大生产运动为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3. 发展商业贸易

抗战爆发前，晋绥地区商业贸易十分繁荣，例如：“磧口1931年商店达二百家，全年流水在五十万元以上者达十余家。保德东关两家大商号，资本达十六万元。”[12]489晋西事变后，由于日军的连续扫荡，商业贸易受到重创。为打破敌人对晋绥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提高根据地广大群众生活水平与根据地政府财政收入，稳定金融市场，发展根据地经济，1941年5月抗战日报发表题为《发展内地商业，组织对外贸易》的社论，在当前阶段重新建立商业贸易体系，保护根据地内商业发展，同时发展对外贸易，确保商业自由变得迫在眉睫。

贸易法律法规是商业贸易的灯塔，引领着商业活动的规范化进程。早在1941年11月，晋西北行署便出台了《晋西北管理对外贸易办法》，为货物贸易设定了清晰的规则框架。紧接着，为防止根据地法币外流，提升农币的流通地位，晋西北行署发布了《关于严禁奢侈品入境的通令》，明确列出了禁止入境的商品清单。随后，到1945年，晋西北财经办事处颁布了《关于晋绥晋绥两边区贸易税收之决定》，详细阐述了两区之间贸易商品互通时应遵循的原则，极大地促进了两区间贸易的便利化。

一系列对外贸易法律法规的出台，对根据地商业贸易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商业贸易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据统计，“仅到1941年8月底，兴县商店由春季的七十六家增至一百七十一家；临县由一百八十六家增至二百四十八家”[13]491。除此以外，商业利润也比战前提高。在游击区、沦陷区的贸易方面，“1944年从游击

区、沦陷区输入食盐572万斤，比1943年增加了130万斤”[13]235，解决了抗战的需要。同时，根据地也输出“羊毛3万斤，碱4万多斤，以及其他土产”供给了游击区、沦陷区群众扩展市场，争取了人心，团结了群众[12]464。

3. 宣传教育：以思想建设引领群众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正如毛泽东深刻指出的那样：“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中国共产党从晋绥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落后、思想觉悟低下的实际出发，通过发展教育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来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1. 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干部教育在根据地教育中占据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教育工作是动员民众的前提，对于根据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民主运动以及大力发展生产建设所具有的意义十分深远。根据地的教育，可分为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共产党组织就把干部教育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根据地开办了干部培训班，有晋西北军政干部学校、晋西北抗战学院、青年干部学校等，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设做了极为重要的人员准备。

社会教育是根据地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民众文化水平和推动社会进步具有关键作用。冬学是晋绥根据地开展的较为普遍的社会教育形式，1945年，边区行署在《关于1945年冬学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冬学是培养干部与积极分子最好的场所，是提高群众的有力武器”。到1947年前半年，全边区冬学教育进一步得到发展。具体内容是“新解放区以政治教育为主，文化教育为辅，分别占70%和30%；老解放区以文化教育为主，政治教育为辅，分别占60%和40%”[14]。在教育方法上，各地贯彻“以干部为主，干与群众一起学习的方针”，采取集体讨论，教员讲授以及运用实物实例、送识字卡上门教学等方法，努力使学员真正接受和理解。据统计，从1944年冬到1945年春的冬学运动，“仅河曲、保德、临县、交城、偏关5县，入冬学的妇女就达到13,628人”[15]362。

学校教育在根据地教育中具有奠定基础、培养人才的关键作用。1940年2月，晋西北根据地政府发布了教育实施大纲，提出了“进一步扩大义务教育，建立健全民族革命小学的施政方针”[16]232。从1940年晋西北行署成立，晋绥根据地就认真抓了小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工作。集体筹资修建校舍，编印教材，优待教师，小学教育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至9月底，“据19个县的统计，已有完全小学校26所、初级小学校1,393所，共有学生61,938人；每县平均有小学校74所，学生3,295人”[15]366。后来，晋绥根据地小学教育工作有许多的开拓与创造，在群众服务，教学与战争、生产、社会相结合方面，亦积累了新鲜经验。

3.2. 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

报纸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对于宣传动员和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具有重要作用。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了在敌前敌后创办各种地方性通俗报纸的指示，以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民族觉悟。晋绥抗日根据地成立伊始，就非常重视创办报纸。1940年9月18日在兴县石楞子村创办了中共晋西区党委的机关报《抗战日报》，在宣传报道中，《抗战日报》始终抓住战争和建设两个环节，把坚持长期抗战和改善人民生活密切结合起来，使报纸成了指导战争和生产的有力武器。《晋绥大众报》也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影响较大的报纸之一，主要以识字在八百个上下的区村干部和农民为读者对象。根据中共晋西区委员会提出的“反映根据地群众的战争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办报方针，《晋绥大众报》采取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设置了“百事通”、“街谈巷议”、“大众信箱”、“政策问答”等多种栏目，文字做到了尽量口语化，把报纸办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

印刷出版是根据地新闻出版发展的基石，对推动信息传播与根据地文化繁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指示：“每一个大的根据地，应开办一个完全的印刷厂，要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要注意报纸刊物书籍的发行工作，要有专门的运输机关与运输掩护部队，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17]“据不完全统计，从1940年到1945年，在晋绥边区发行的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著作有66种，编印出版的政治、军事、经济、文艺等各种读物有123种，发行总数100万余册。”[18]

晋绥根据地通过发展新闻出版事业，向根据地广大军民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评价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和战争进展状况，传授了文化科学知识技能，使新闻出版事业在宣传人民、组织人民、打击敌人、建设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3.3. 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

“不同地区的娱乐生活体现着不同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民俗的发展情况，不同时期的娱乐活动反映着不同时代的精神风貌”[19]。晋绥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初，就十分重视文艺的作用，力图通过各种文艺形式引导、教育与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配合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戏剧在根据地文学艺术发展中扮演着丰富民众精神生活、推动文化繁荣的重要角色。随着晋绥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根据地建立了大量的专业剧团与业余剧团，演出各种形式的剧目，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1940年5月30日，晋西北各剧团在兴县李家湾进行了为期17天的会演，参加会演的有一二零师的战斗、战火、战力等剧社和决死二纵队的黄河剧社等”[20]48。1943年4月7日，晋西民间戏剧研究会召开了扩大理事会，提出了以“科学的、革命的、批判的”观点，对民间戏剧形式加以运用与改造，以提高群众参战和生产的热情以及政治文化水平[20]67。抗战期间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戏剧活动极大地充实了群众的精神生活，活跃了乡村的娱乐氛围，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

节日，例如春节娱乐在乡村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没有哪个民族能够抵抗从持续劳作突然转到完全歇业所带来的冲击，而半个月清闲之后又将重复一年的操劳”[21]，因此，春节是闹红火、开展娱乐活动、进行思想政治宣传的绝好时机。晋绥抗日根据地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在春节期间广泛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对群众进行潜移默化的政治教化。1942年春节即将到来时，抗联指示各级把擅长各种娱乐技能的人们集中起来，事先练习各种配合减租减息、改造组织、反法西斯等的宣传工作。1942年3月5日，《抗战日报》也利用春节大量组织秧歌队，以活跃农村娱乐。晋绥革命根据地在春节娱乐活动中，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一时期的春节娱乐活动不再仅仅是乡村民众娱乐的形式，而且成为中共表达意识形态的载体。

4. 军事保障：以拥军政策鼓励民众

毛泽东曾说：“兵民是胜利之本。”1938年1月，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即指出：“采取好的动员方式，使前线能够得到源源不绝的补充，益能组织足够数量的新军队。必须了解，全国民众对日寇的侵略是深恶痛绝的，只要我们能采取较好的方式，去诱导他们，鼓动他们，必定能够鼓起他们最大的决心与勇气，自动地奔上前线，为光荣的民族解放事业而战斗。”[4]3抗战时期，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军、地党委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民众加入到抗战队伍中，推行了一系列拥军拥抗的政策，鼓励参军、参战、支前。

4.1. 开展“四大动员”

为解决政权建立之初的财政困难，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于1940年2月26日在临县曜头村召开会议，作出了开展献金、献粮、扩兵、做军鞋四大动员的决定。在各级政权的组织发动下，广大群众积极行动，2个月内即完成全部任务。

晋绥边区的爱国士商和各界群众积极响应号召，慷慨解囊，为抗日斗争提供资金支持。这些资金被用于购买武器弹药、医疗物资等军需品，以及支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在敌人的封锁下，粮食成为根据地紧缺的资源之一。

晋绥边区的农民群众纷纷捐出余粮，支持抗日军队和根据地的粮食需求。这些粮食不仅保障了军队的口粮供应，还用于救济灾民和支援前线战斗。为了增强抗日力量，晋绥边区积极动员青年参军入伍。许多青年响应号召，加入抗日军队，为保卫家园和抗击日寇贡献自己的力量。扩军行动使得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军队规模得到扩大，战斗力得到提升。军队在战斗中需要大量的军鞋来保障士兵的行走和作战需求。晋绥边区的妇女们积极行动起来，为抗日军队缝制军鞋。这些军鞋不仅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还体现了人民群众对抗日斗争的支持和贡献。

“据统计，共筹集粮食90,426石，献金1,810,625元，做军鞋118,441双，扩充新战士15,885名”[3]41。这些成果对解决根据地困难、壮大人民武装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书记处曾对此给予了肯定：“创造晋西北根据地和‘四大动员’都获得了很大成绩。”“四大动员”也激发了晋绥边区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增强了他们对抗日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在支援战争、支持根据地建设、维护新政权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4.2. 实行精兵简政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以节约人力物力。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提高工作效率和部队战斗力，晋绥革命根据地党和政府与八路军响应中央号召，认真执行精兵简政的政策。

1941年12月下旬，晋西北军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学习讨论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并结合实际情况，决定了部队的精简计划和编余人员安置的原则与办法。经过整顿，“全军区主力部队由3.9万余人减至

3.5万余人，裁减公务人员731名，第一二〇师和新军部队共减少伙食单位达118个。对编余和裁减的近5,000人，除充实连队外，其他都作了适当安置”[22]。在已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晋绥边区于1942年9月进一步提出了“裁、减、缩、并”的精简原则。结合毛泽东于1942年12月关于《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即各根据地“对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晋绥根据地继续开展精兵简政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20师及新军人数由35,000人又缩至27,000人，地方武装缩至4,500人；边区行署也经过大规模精简合并压缩了机构，整个政权人员由18,037人减至7,489人”[16]365。

晋绥革命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使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的脱产人员达到了中共中央规定的比例要求，适应了坚持抗战的需要；又大大地节约了财政支出，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缓解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以精简的干部加强基层的措施，进一步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并为培训干部、积蓄力量提供了条件。

4.3. 开展双拥运动

群众路线是中共革命胜利的一个法宝。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晋绥抗日根据地通过开展“双拥”运动，汇聚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力量，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3年4月，晋绥军区政治部发出“关于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规定5月为“拥政爱民月”。同时提出拥军三大中心任务，中心任务立足于帮助军人解决困难。5月6日，贺龙在《抗战日报》发表题为《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的署名文章。随后，各部队纷纷订立“拥政爱民公约”，并宣读公约誓词，各专署、县也都相继组织了拥军委员会，并普遍召开了拥军大会。另外，广大人民群众也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拥军优抗之中。在部队作战时，人民自动上前线送水送饭，冒险救护伤员。各地帮助军队生产，对抗属则代耕互济，帮其翻身。“据9个县不完全统计，仅上半年给优抗粮食即达12,760斤，互济粮食尚不在内”[3]71。除此之外，春节、端午、中秋节一般都成了拥军优抗的节日，除慰问慰劳抗军人外，还举办军民座谈会、军民联欢会等。

双拥活动的开展，使晋绥军、政、民团结得更加紧密，抗日民主政权的威望大大提高，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支前热情，使晋绥根据地各项建设和对敌斗争都取得了巨大胜利。

5. 结语

中国共产党在晋绥革命根据地开展群众抗战动员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为人民而奋斗，同人民患难与共的一段历史。党在晋绥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动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四个方面，依托组织保障、利益整合、宣传教育等多样化的动员方式，尽可能动员不同阶级阶层的爱国群众共御外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抗战动员工作是对党的初心和使命的生动诠释，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对于今后中国共产党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借鉴。

进入新时代，开展好群众工作仍是重中之重。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仍然需要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参与。人民的心声就是党行动的方向，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绥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群众动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面对新时代新任务，党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之上，结合新时代的世情、国情，创新发展群众动员的内容与方式，建设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 晋绥革命根据地史 [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 261.
- [2]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M].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522.
- [3]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 晋绥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 [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8.
- [4]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5] 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 [M]. 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31.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17.
- [7]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 毛东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225.
- [8]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集: 第11册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217.
- [9] 中共中央政治局.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 [N]. 解放日报, 1942, (02): 6.

- [10]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 山西档案馆.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 [11] [美]马克·赛尔登, 魏晓明, 冯崇义译. 革命中的中国: 延安道路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238-239.
- [12]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 山西省档案馆.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金融贸易编)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 [13]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 山西省档案馆.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编)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 [14]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 晋绥革命根据地史 [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 570.
- [15] 张国祥. 山西抗战史纲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
- [16]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 山西省档案馆. 晋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 [17] 谢忠厚, 肖银成.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 [M]. 北京: 改革出版社, 1992: 261.
- [18] 兴县志编撰委员会. 兴县志(下)(送审稿) [M]. 未公开出版, 463.
- [19] 王荣花. 中共革命与太行山区社会文化的变迁(1937-1949) [M]. 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1.
- [20] 郭士星, 孙寿山. 晋绥革命根据地文化大事记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3.
- [21] [美]明恩溥著, 陈午晴等译. 中国乡村生活 [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6: 159.
- [22] 张国祥. 山西抗战史纲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 194.